

10.05

河陽文史資料

第二輯



目 录

- 一、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创建人——张星烺
.....张铁伟(1)
- 二、回忆张星烺先生.....万心蕙(10)
- 三、陶懋立先生传略.....陶兴鏢 庄美邨 奔流(13)
- 四、泗阳县中等教育发展史回忆录
.....张天麟口述 张海珊整理(23)
- 五、回忆淮海中学.....许德良(32)
- 六、在战斗中学习.....徐俊(40)
- 七、忆抗日战争中的淮海中学.....
姜亚东 胡雅德 孙爱琴 李均彦 洪其元(56)
- 八、熔炉正青.....翟如碧(69)
- 九、在日寇眼皮底下坚持办学.....倪彦棋(78)
- 十、忆淮海中学统战工作片断.....徐其安(85)
- 十一、回忆淮海六中的教育活动.....刘家田(89)
- 十二、忆淮海六中的干部班.....徐化民(94)
- 十三、解放区淮泗县教育工作回忆.....陈益三(97)
- 十四、边区办学 投笔从戎.....倪谷如(104)
- 十五、为复课冒险去见韩德勤.....王龙化(108)

十六、抗日烽火连天 南园书声琅琅…宾 礼	(113)
十七、抗日时期的泗沭桃源书报合作社	
.....奔流整理	(122)
十八、对三十年代泗阳农民教育馆的回忆	
.....司锦文	(127)
十九、1939—1949年泗阳教育大事记	
.....庄美邨 奔流	(135)
关于征集文史资料的一封信.....	(147)
文史资料工作动态.....	(149)

我国中外关系史学科创建人——张星烺

张铁伟

张星烺是我国著名学者、中外关系史学科的重要创建人之一，50多年前出版的他的学术名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六大册，奠定了我国中外关系史这一学科的基础。从这以后，他还发表了许多专著，并且在几个大学里开设“中西交通史”课程。我国现代中西交通史专家张维华教授指出：“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是中华民族同西方各民族物质、文化交流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中西交通史’一辞，最早出现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前此，关于中西关系方面的研究，命名是相当混乱的。直到三十年代初张星烺、向达正式提出‘中西交通史’的概念，作为一种专门史。……二、三十年代，我国中西交通史的系统研究进入了草创时期。……确定了这一学科的正式名称，建立了中西交通史的体系，虽然这一体系并非是完全科学的。主要以《中西交通史》（向达，1930）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星烺，1930）两部著作的问世为标志。”

(一)

张星娘，字亮尘，江苏泗阳人，1888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1年7月13日病逝于北京。他的父亲张相文是我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我国最早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之一——中国地学会的创始人。张星娘幼年曾跟随父亲学习历史、地理和古典文学。12岁时就读完《左传》等书，后来到上海南洋公学读书。他求知欲很强，学习勤奋，继而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06年被选派到美国留学，进入哈佛大学化学系学习。1909年毕业后又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生物化学。他是我国最早攻读生物化学的研究生。当他正在德国读书时，祖国发生了推翻清皇朝的辛亥革命。他的父亲张相文是当时北方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的组织者之一。父辈的革命思想对张星娘起了很大的影响，在他内心燃烧起为振兴中华而发奋上进的强烈火焰。

张星娘在柏林大学取得学位后，谢绝了外国的重金聘请，于1912年回到了祖国。他抱着“实业强国”的思想，满腔热情地投入科技工作，期望把自己在国外所学的科学技术知识贡献给祖国。他先后在汉阳兵工厂和江苏省公署实业公司工作。后来辗转南北，为了谋生寻求职业，曾在湖南高等工业学校任教，在青岛四方机车厂主持化验室工作。当时，他的工作很不稳

定，生活困难，工作劳累，患了肺结核病，由于无钱住院治疗，只好去浙江黄岩岳父家养病。他岳父是清末知名的国学家，家中藏书很多，张星烺利用养病之机饱读史书，钻研和摘录有关史料。这段时期对他从事历史研究提供了良机。

当时，国民党统治政治腐败，时局动荡，使张星烺的“实业强国”思想逐渐破灭。他既不擅长交际酬酢，又不屑于钻营逢迎，只希望通过学术研究对国家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他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的自序中说，近代中国的外患，都是来自欧洲，弄清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关系，可以了解双方势力的消长情况，这是一件急需做的事。正是基于这种爱国主义思想，他发奋利用业余时间钻研历史，搜集中西交通史资料。后来，他完全脱离了科技工作，专门从事历史研究。1926年，他终于完成了《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初稿。同年9月到1927年1月，张星烺受聘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约一年后，他来到北京，受聘于辅仁大学，任历史系主任。同时，在北京太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课，先后讲授过《中西交通史》以及《秦以前史》、《宋辽金元史》、《南洋史地》、《政治地理》等课程。他还担任过蔡元培领导的国史编纂处的纂辑员。除任教外，他还继续不断地搜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有关史料。为了介绍外国有关中外交通史方面的资料，

他还翻译了一些名著。他先后翻译了两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第一种是英国学者亨利玉尔译注的版本，计五卷，他译出了导言和第一卷，分别在1924年和1929年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文版本。以后他又译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另一版本——拜内戴托著的普及本，于1936年出版，收在万有文库中。1933年，他的《欧化东渐史》问世。后来，在《辅仁学报》、《燕京学报》、《华裔学志》、《地学杂志》、《禹贡》等刊物上还发表过不少学术论文。

(二)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是张星烺先生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多年的主要学术成果。为了撰写《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这部巨著，他利用十多年业余时间搜集史料，从中文的正史偏史、游记、文集、笔记等74种书籍和英文、德文、日文、法文等42种书籍中摘录有关资料。有的书部头很大，册数很多，如二十四史、《册府元龟》等。查阅这些资料，需要有巨大的毅力，正如他在自序中说的：“从事搜查，犹之淘海底而探珍珠，往往搜查丛书一部，耗费光阴数月，而所得仅一、二条可以适用……。”另外，他摘录的许多外国著作，有的是首次发掘和引用。他所辑录的材料范围之广，内容之丰富，是惊人的。上自天文、下至

地理、民族、文化、科技、历史、政治、经济、动植物以及重要历史人物，无不一一采撷，一些科学考证还有重大发现。

1930年，《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正式出版。全书共分六大册，3,000多页，100余万字。全书按八个题目编写：一、上古时期中外交通；中国与欧洲交通；二、中国与非洲交通；三、中国与阿拉伯交通；四、中国与亚美尼亚交通；五、中国与犹太交通；六、中国与依兰（伊朗）交通；七、中国与中亚及土耳其交通；八、中国与印度交通。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除资料十分丰富外，还大量引用和介绍了过去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近代西方的一些中国学研究者，利用语言学和考古学的知识，把中国边疆地区的历史与世界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了不小成果。《汇编》着重介绍了西方的中国学者如夏德(F·Hirth)、玉尔(H·Yule)、劳费尔(B·Laufer)、白莱脱胥乃窦(E·Bretschneider)等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书中大量地引用了玉尔的《古代中国闻见录》(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一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绝大部分我国过去还没有翻译介绍过，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还包括了不少作者个人的研究心得，特别是穿插在各章节中的《附录》，实际上就是作者的专题研究论著。如第一册附录中的

《支那名号考》，文中首先论述了“支那”一名的起源及各家说法，然后详细地论证了“支那”即“秦”的论点，澄清了这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又如第二册附录《昆仑与昆仑奴考》、第五册附录《唐代西域人组成的军队考》等，都很有学术价值。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初版问世后，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热烈称赞。当时辅仁大学校长陈垣、著名史学家朱希祖和美国学者奥图尔都给予张星烺及其著作以非常高的评价。他们认为：（一）《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对于资料考证有许多新的发现；（二）这部著作远远超过外国学者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张星烺是中国第一位有系统并且比较完整地编写中外关系史的历史学家；（三）《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在当时讲来，它的体裁和整理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四）张星烺以他的巨著创建了中外关系史这门新的学科；（五）为我国研究中外关系史开辟了一条道路，对后来研究中外关系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汇编》在国际上也有较大影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教授在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也多次引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上的材料。直到今天，我国研究中外关系史的学者还时常参考和引用张星烺的著作。

（三）

张星烺治学严谨，刻苦勤奋，在他从事研究工作

期间，生活极不安定，身体状况也很不佳，但仍坚持写作。他说：“十余年南北奔波，挟稿以随，稍有余暇，提笔书之，盛暑挥汗，严冬呵冻，未尝辍笔，凄风苦雨，孤灯寒月，费尽心力，始得毕业。”（《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他常说自己天资不高，因此只能勤奋。他的艰苦奋斗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在他写作用的铜墨盒上镌着韩愈关于治学的名言：“业精于勤荒于嬉”。“勤能补拙”也是他经常用以勉励自己的格言。

张星烺是一位民主、进步的知识分子。早年追随辛亥革命，晚年心向共产党。他为人刚直不阿，是一位有骨气的历史学家。他对旧社会腐败政府猛烈抨击，痛恨贪官污吏。他对一些人接受曹锟贿选痛斥为出卖灵魂，自己宁可无钱治病也不接受那几个臭钱。张星烺先生在旧社会生活了几十年，对帝国主义侵略、欺压我中华民族，国民党卖国求荣，大肆屠杀爱国人士，表示深恶痛绝。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历史和她的宗旨教育了这位史学大师。他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华民族利益，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在那黑暗的年代里，他得到地下党的帮助，阅读了地下党组织给他的宣传品，使自己的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他积极保护了一些地下党员，把自己的家作为掩护所，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在解放战争中，他的心与人民解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经常

深夜收听陕北电台的广播。解放后，北京市曾特邀他以爱国民主人士身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可惜他因重病未能参加会议。1951年7月13日，这位中西关系史大师因久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

(四)

张星烺的名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赢得了盛誉，但他并不满足自己的成就。自《汇编》初版到他逝世的二十多年中，他又搜集和增补了几十万字的材料，准备修订再版。可惜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亲自修订再版的工作未能完成。他遗言将自己所有藏书和手稿赠送给中国人民大学。他去世后，国内许多专家、学者要求整理出版张星烺的遗稿。1982年9月5日，费孝通先生在致胡愈之的信中说：“据吴文藻先生和我谈起，张星烺遗稿应该整理出版。张星烺是过去辅仁大学教授，著有《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书，对亚非和中国历史关系颇有研究，遗稿中定有富有价值的东西。”费老在致胡老的另一信中说，“我们的意见最好能把张星烺的遗稿整理出版。不仅在学术上有贡献，也是对知识分子从事研究工作的鼓励，有市骏骨而千里马自来之意。从政治上考虑是值得做的。”胡愈之同志也表示同意。董必武同志生前也非常重视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书，他认为要搞好新中国的外事工作，必须学习我国过去对外关系史。在董

老的亲切关怀下，我国著名中外关系史专家朱杰勤教授将张星烺先生的原书和他遗留下来的部分增补材料，加以校订，于1976年由中华书局重新排印出版。董必武同志亲为该书题名。新本统一了全书体例，调整了一些不合理的章节安排，把引书资料和编注者的话区别开来，对引书原文尽可能找到出处加以核对，并统一了全书的标点符号。可惜新本对原著删节过多，而增补的资料只占张先生遗留下来的几十万字中的很小一部分，且系内部发行，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深入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和广大学者、读者的需要。

现在，张星烺先生已经逝世30多年了。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他的许多学术著作，是极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今天，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深入开展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加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意义尤为重大，希望这方面能有更多的新作问世。这也是我们对张先生最好的纪念。

回忆张星烺先生

万心蕙

编者按：本文作者万心蕙女士原是辅仁大学历史系1942年毕业生。毕业后曾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又赴美攻读历史。现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一九八〇年曾回国讲学。本文是万心蕙女士应张星烺先生亲属之约撰写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的辅仁校园中，谁不知道有一位鹤发童颜、和蔼可亲的教授。那就是我们历史系主任张星烺先生。张先生那时也不过五十岁出头，但他是少白头。由于洋教士的庇护，辅仁不大受日本人的干涉。一些不能去大后方的学者学生们，多避难在这个孤立的教会学校中。

张先生当时开的课有先秦史、宋辽金元史、中西交通史及欧化东渐史等。上课的时候，总是循循善诱，还常用科学现象来譬喻历史，非常有趣。原来张先生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学理科，后到美国哈佛大学及德国柏林大学学化学，精通数国文字。他父亲张相文先生是知名的史地学家，所以家学渊源。他自己也有旧学

基础，喜欢史地。先生后因患肺病，不能继续化学工作，”转工历史。

张先生著述甚多，最主要的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此书不但介绍了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並收集了大量中国史料及学者在这方面的著述，指引启发后学，影响贡献极大。不但国内已再版此书，台湾在一九六二年也再版了。先生著此书的动机，在于看见欧西人氏用实地考察的方法，对中国历史作详尽的研究，但中国人尚不知多用此法研究自己的历史。至于对外国历史，更是漠漠无知。他有慨于近代中国的外患多来自欧洲，“自鸦片战后，无役不丧师，割地赔款”，“人几为砧上肉，釜中鱼视我矣”。因而应弄清中外交通历史，可以了解双方势力消长情况，以长自己志气。为激励后学，乃费时十余年，汇集中外史料，分类编集。其中虽有很多新的见解，但不名之为“史”，以见先生的谦虚。近据张先生家属函告，星娘先生晚年还补集了很多材料，但文化革命时手稿全部遗失。此外张先生在各杂志中发表的文章数量也很多，国外所瞩目的已有二三十种。

先生不但为知名学者，並对待学生关心爱护异常。特别是我，父亲早年去世，一贫如洗，我在辅仁就是靠奖学金及亲友的帮助读出来的。虽然连年考第一，毕业时终不得留校。因为我非教徒，又勇于反抗，深不为天主教修女所喜。张先生虽身为系主任，

但大权在洋教士手中，于我也是爱莫能助。我只得回天津，找了个中学教书，奉养贫病交加的寡母。日本投降的前一个月母亲故去，我写信给张先生，表示希望能回辅仁作事，以便继续进修。辅仁其时仍不能给我一立足之地，张先生听见燕京大学即将北返，乃自北京鼓楼大街步行到东单洪燮莲家，为我打听燕京研究院复校情况。这一件事是多年后洪先生在美国告诉我的。洪先生说：“张先生对你真是比自己儿女还关心，他步行到我家，把鞋都走破了。还希望以后我能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总算侥幸不负老师所期，考上燕京史学研究所，以第一名拿到燕京哈佛教金。我这赤贫的学生，竟走进了当时最贵族的学府，先生之于我，不但是老师，而且是父亲。就是别的同学也爱戴他为和蔼慈祥的长者。旧社会中自古文人相轻，先生作史学的途径，又与别人不同，免不了为一些学者所歧视。同学们为此及他的不能有实权，都非常气愤。但张先生自己对我们从没抱怨过，也从来没有菲薄过别的学者，这也就更使我们敬爱他。

最后见张先生是一九四八年初，出国之前去他家辞行。他留我吃晚饭，谈了很久，对我期望甚高。但生活中牵扯的事情太多，未能如老师所期望，衷心内疚。那天张先生又告诉我他牙肉出血，肾脏有病。我心里很难过，谁想那竟成为最后的一面。

陶懋立先生传略

陶兴燦 庄美邨 奔 流

陶懋立，字卓如。江苏泗阳人，家住今城厢乡陶庄村。他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为前清秀才。陶懋立幼年，稳重敦厚，聪颖绝伦，勤奋好学，加之家学渊源，更促其早岁成名。在其父亲锐意熏陶下，青年时代即为桃源县童生之秀，继中秀才。因学行优异，屡试皆列前茅，补廪生。

陶懋立与我国近代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张相文为总角交，极为友善。张相文（1866—1933）泗阳南园人（今城厢乡要武村）。与陶又是同乡。他们都很热心于地方文教、公益事业。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张相文与南通张謇，阳湖恽祖祁、崇明王清穆等，在上海组织教育总会，并提倡各县设立分会，图谋进步，研究教育改良。是年，张相文回里，与陶懋立创办桃源县教育会，初名学会，第二年改称教育会，张相文与陶懋立被选为正副会长。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则是王聿望与陶懋

立为正副会长。会址原设在桃源县城（今城厢乡）北门集义两等小学内，后迁高等小学，复迁淮滨书院。经费由会员缴纳和政府补助，每年补助银洋一百八十元，以研究教育为主旨，开展活动。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陶懋立还与王聿望、蒋观极、李景山、潘儒林、刘怀孝等地方人士，在县城北门创办了桃源县公立集义两等学堂，校址设在火神庙内，聘请的教员都是纯尽义务，因是上述人等集资筹办，故名“集义”。后改为第一区第一国民学校，为泗阳县诞生最早的第一所公立小学。陶懋立还为此校撰写了《碑记》，载入《泗阳县志》中。

在廪学时，陶懋立被福建督军李厚基聘为省纺织厂厂长兼商品陈列所、工艺陈列所总办，并参与政事，任李厚基的闽浙援粤总司令部秘书。当时，李厚基的母亲，非常器重陶懋立，嘱师事之。因而陶得任李援粤总司令部秘书，当时陶心向革命，曾劝说李不要反对孙中山，李不听，孙中山攻闽时，陶即离开李部回泗阳老家。他沿闽江上行，经仙霞岭、浙江、上海，沿途写下了《闽航纪事》手稿，收入他的著作《素墨堂存稿》中。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张相文辞去桃源教育会长职务，由海州许鼎霖推荐，应江北提督刘永庆之聘，任淮阴江北师范学堂教务长。陶懋立也离开桃源到江北师范任教员。